

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(六)

李致忠

《周易》九卷 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 唐陆德明释文 《略例》一卷 唐邢琇注。宋刻本。董其昌、文嘉、文震孟、文从简、秦蕙田跋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廿一二字不等，注文双行，行廿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王弼，字辅嗣，三国魏山阳（今河南焦作市）人。生于魏黄初七年（226），卒于魏正始十年（249），时二十四岁。可谓英年早逝，年少才高。曾任尚书郎。好谈儒、道，与何晏、夏侯玄同开玄学清谈之风，世称“正始之音”。他认为道是无之称，天地虽大，寂然至无，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，对道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。更从凡有皆始于无，肯定名教之有出于自然之无，以援老入儒的方式，为封建伦理纲常进行辩护，即以新的玄学代替了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经学。其注《易》便是以这种哲学思想加以诠释的，故偏重哲理的阐述，而一扫汉代经学章句的烦琐之风，为《周易》的训释辟一新径。

今其书《周易上经乾传》第一；《周易上经泰传》第二；《周易上经噬嗑传》第三；《周易下经咸传》第四；《周易下经夬传》第五；《周易下经丰传》第六；《明彖》之下题，均署王弼注。《周易系辞上》第七；《周易系辞》卷第八；《周易说卦》第九之下题，均署韩康伯注。《周易略例并序》之下题，署唐四门助教邢琇注。三者合一，凡为十卷。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将

王、韩之《易》注分别著录，《易》注作六卷、《略例》作一卷、《系辞》注作三卷，总共为十卷。考王俭《七志》（据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所征引），已称王弼《易》注为十卷，则并王、韩之书为一书，其来久矣。

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称：“自郑玄传费直之学，始析《易传》以附经。至王弼又更定之。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，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。然郑氏《易注》至北宋尚存一卷。《崇文总目》称存者为文言、说卦、序卦、杂卦四篇，则郑本尚以‘文言’自为一传，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、象传。今本乾、坤二卦各附‘文言’，知全经皆弼所更定，非郑氏之旧也。每卷所题乾传第一、泰传第二、噬嗑传第三、咸传第四、夬传第五、丰传第六，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。据王应麟《玉海》，此目亦弼增标。盖因毛氏《诗传》之体例。……其《略例》之注，为唐邢琚撰。琚里籍无考，其结衔称四门助教。案《唐书·王铎传》称为鸿胪少卿邢琚。子绌以谋反诛，则终于鸿胪少卿也。……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。……平心而论，阐明义理，使《易》不杂于术数者，弼与康伯深为有功；祖尚虚无，使《易》竟入于老庄者，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。瑕瑜不掩，是其定评。”上述提要，将王弼、韩康伯、邢琚所注《易》之学术渊源，单行合并及训解得失，已叙述得清清楚楚。

王、韩注《易》在宋代究竟有过多少版本，已无法详细稽考，仅就所知，大概有过宋刻十行本；有抚州公使库刻群经本；还有前人误解的岳氏荆溪家塾刻群经本。这些版本恐都不如本文所要介绍的这个宋刻十二行本。

此本在明代曾先后为文嘉、董其昌、文震孟、文从简诸名家所收藏，迄今书中有上述诸人题记可证。一曰：“万历庚辰（八年，1580）三月二日文嘉阅。”一曰：“天启七年（1627）丁卯岁三月六日董其昌观于顽仙庐。”一曰：“崇祯壬申（五年，

1632) 午日黄子羽携过青瑶屿，与张异度同观，去先叔祖文水翁题识时已五十二年矣。震孟。”一曰：“崇祯甲戌（七年，1634）阳月过趺影斋，焚香观。陆孟兕、曹孟林、葛君常在座。文从简。”文嘉、董其昌、文震孟、文从简，都是明代以工书画而享誉海内的人。他们递藏此书，并撰写题记，说明他们对此书是很珍重的。推其原因，他们并非好古佞宋，很可能因为此书在字体上有值得他们赏识的地方。

此本版口上方未镌本版大小字数，下方亦未镌刊工姓名，有别于通常所见的宋版书。皮纸印造，楮墨精良。字体似手写，结构稍显松散，笔势清瘦，颇有些瘦金书的味道，与宋代浙刻、蜀刻、闽刻及江西刻本均不相类。文、董辈对此本特殊垂青，可能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。

明末清初，此书归入毛氏汲古阁，以其钤有“甲”、“宋本”、“毛”、“晋”、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汲古主人”等印记可证。从汲古阁散出后，又归入徐氏传是楼，以其钤有“徐健庵”、“乾学”等印记可证。从传是楼散出后，又归入秦氏味经窝。味经窝是秦蕙田的藏书楼。秦蕙田字树峰，清代前期无锡人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进士。授编修，官至工部尚书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调刑部尚书，仍兼领工部，加太子太保。蕙田通经能文，尤精于三礼，撰《五礼通考》。又好治《易》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，皆有著述。大概就是因为他又好治《易》，故此本《易》注便又由徐氏传是楼辗转归入秦氏味经窝。以其钤有“味经阁藏书记”“蕙田之印”等印记可证。

秦蕙田生活的时代，正是乾嘉考据学兴起的时代。受此影响，秦蕙田为了治《易》，也须搜集《易经》的各种珍本、善本。此宋刊王、韩注《易》便是他搜集到的珍贵版本之一。书中跋文称：“此真北宋佳本，人世存者渺矣，宜董、文诸公钦爱而珍异之。吾家世有旧刻，久多散佚。此书得之玉峰徐氏，吉光片

羽，为味经窝藏书第一，子子孙孙其善守之。乾隆二十九年岁在甲申味秦蕙田识。”秦蕙田卒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九月，盖得到此本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，便与世长辞了。因而这道跋文也就未写出水平，连版本也鉴定错了。跋文首句说：“此真北宋佳本”，其实此书根本不是北宋刻本，而是刻于南宋孝宗之世。书中構、遘、媾等字缺笔，避的是南宋初帝赵構的名讳，已能证明此本绝非北宋镌雕，而开版已入南宋了。再考卷一“慎不舍也”中的“慎”字、卷六“以慎辨物”中的“慎”字、卷七“慎之至也”及“慎斯术也”中的“慎”字，均缺末笔，表明南宋孝宗赵昚的嫌名也在回避之例。而光宗赵惇的嫌名则不行回避。如敦、惇等字皆不缺笔。说明此书之刻尚未到光宗之世。因此可以结论，此书之刻必在孝宗之世的二十余年。宋室南渡，出现中兴状况，大约在高宗绍兴十年（1140）至孝宗淳熙末年（1189）这四十余年中。官私刻书出现盛况，亦在此期。迄今存世的宋版书中，相当的比例是刻在这个时候。此本刻在孝宗之世，亦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。

秦蕙田死后，他的子孙未能善守，故此书又辗转收归汪士钟珍藏。以其钤有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阆原又用”等印记可证。汪士钟字闾源，清长洲人。藏书甚富，凡于有版以来之官私刊本支流派别，心开目瞭，遇则能名。且其所藏宋、元本书，既精且博，海内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。此宋本王弼《易》注，当即在这时归入汪氏艺芸书舍。然汪氏藏书好景不长，早在咸丰六年（1860）以前已开始散佚，兵燹以后，遂荡然无存。故此宋本王弼《易》注，便又辗转归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。以其钤有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绍基秘笈”、“瞿印秉清”等印记可证。且于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一予以著录，称：“《周易》十卷，宋刊本。《经》九卷，《略例》一卷，通为十卷，与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合。分卷与陆氏《释文》、《开

成石经》、《相台岳氏本》合。九卷中分序卦第十、杂卦第十一，为子卷，亦并合。卷一首行题‘上经乾传第一’，下夹注释文周代名也云云，至次行止。三行题王弼注。四行题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释文附。卷二以下无唐国子至释文附二行。《系辞》以下题韩康伯注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廿一、廿二字不等，注文双行，行廿八字。宋讳殷、匡、筐、恒、贞、征、惩、構、媾、遘、慎等字皆缺笔，而敦字不缺，盖孝宗时刻本也。其经文之异于通行本者（略）……。经惟《易》为完书，流俗刊本，日失其旧，是正文字，赖有宋槧。而是本足资订补，尤非他宋槧可及，故以弁冕群籍焉。卷末有明人题记数则（略）。后又有秦文恭跋。”

这段提要大体是四部分内容：第一部分是对该本的自然描述，今以原书核对，瞿氏描述可称简准且详。所谓“与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合”，指的是此本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所著录者相合。检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一，著录《王弼周易》十卷，称：“右上下经，魏尚书郎王弼辅嗣注；系辞、说卦、杂卦、序卦，弼之门人韩康伯注。又载弼所作《略例》，通十卷……”。今以原书内容、分卷相核，确与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者相合。表明瞿氏所言不为虚说。第二部分是检核讳字，考定版本，得出了此为南宋孝宗时所刻的正确结论。第三部分是经过与通行本的校勘，评论版本得失，得出了“是本足资订补，尤非他宋槧可及，故以弁冕群籍焉”的正确评价。第四部分是记录本书上的前人题跋，所钤印记，以示此书之流传有绪。

综上所述，此书之版本应著录为南宋初期刻本，是现存王注《周易》最早的刻本之一。

《周易本义》十二卷《易图》一卷《五赞》一卷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（1265）吴革建宁府刻本。每半叶六行，行十五

字，小字双行，行字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朱熹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菴，别称紫阳。生于南宋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卒于南宋庆元六年（1200），享年七十岁。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上饶地区）人；曾任秘阁修撰等职。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乃至自然科学，都有深浅不同的造诣。在哲学上他继承并发扬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，集理学之大成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，世称为“程朱学派”。他的理学一直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，在明清两代被提到了儒学正宗的地位。他的博学精神和精密分析的学风，对后世学者影响也很深。且广注典籍，计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及《周易本义》等。

自宋元以来，《易》宗程、朱。程传《周易》，经文从王弼本，以传附经；朱传《周易》经文从吕祖谦考定之古本，分为上下经二卷，十翼自为十卷。音训亦取吕祖谦所撰者。薛瑄《读书录》称：“朱子《本义》依古《易》次序，自为一书，不与程传杂，最可见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。后儒摘以附程传之次，失朱子之意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·周易本义》提要引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亦称：“洪武初，颁《五经》天下儒学，而《易》兼用程、朱，二氏亦各自为书。永乐中修《大全》，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《程传》之后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。”提要又称：“割裂《本义》以附《程传》，自宋董楷已然，不始于永乐也。”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南宋咸淳元年（1265）吴革刻本，仍保持朱子《周易本义》旧第。

此书前有吴革刻书序文，称：“象占《易》本义也。……程子以义理为之《传》，朱子以象占本其义，革每合而读之，心融体验，将终身玩索，庶几寡过。昨刊程《传》于章贡郡斋，今敬刊《本义》于朱子故里，与同志共之。……咸淳乙丑立秋日后

学九江吴革谨书。”序文中明言此书是由吴革主持开版镌刻于朱熹的故乡。朱熹之家本世居婺源。按婺源宋时本属徽州，地临江西上饶及九江。十三岁时，由于父亲病故，移家福建建宁府之崇安县，后又徙建阳之考亭，因而建宁就又成了朱熹的第二故乡。吴革序中所称“今敬刊《本义》于朱子故里”，“故里”何指，需要考订。

考康熙《九江府志》卷九之吴革传，称他曾作过建康府知府。按“建康”乃“建宁”之误。检康熙《建宁府志》职官知府卷，果有吴革。这就与他镌印《周易本义》序中所列年款“咸淳乙丑立秋日”相吻合了。所以序中所言“今敬刊《本义》于朱子故里”，必指建宁，因知此书乃建宁官板。且考此书之刻工，如邓生、吴文、阮生，亦曾刻福建漕治本之龟山、张子两语录，进一步证明《本义》之刻必出建宁。故此书之版本，应著录为“南宋咸淳元年（1265）吴革建宁府刻本”。

此本版框高24厘米，广15.5厘米。每半叶六行，行十五字。注文双行，行字同。白口，左右双边。这种款式，在宋版书中是极其少见的。宋代刻书，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律，即刻书的行款疏密，取决于刻书单位或个人的财力物力和对作者的崇信程度。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之书，特别是儒家经典，就敢与国子监相媲美，行宽字大，均为八行款式，且纸墨精良。原因是茶盐司主管茶盐专卖税务，财力充裕，刻书自然就铺陈讲究。而宋婺州市门巷唐宅所刻经书《周礼注》却是每半叶十三行的款式。绍熙二年（1191）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经书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、《礼记注》，也只是十一行的款式。可见私宅、书坊即或是刻经书，也达不到八行的规格。这无疑是财力不敷或是为了廉价多销。而吴革于咸淳元年在建宁府所刻朱熹之《周易本义》，则一反前时之旧章，空前绝后地取了每半叶六行的款式，创造了宋代刻书史上行格最疏朗的奇迹。推其原因，盖有如下几点：其一，吴革是江

西德安人，德安属九江府，与朱熹出生的婺源不算太远。且吴革既曾读书于朱熹讲过学的白鹿书院，有霑先贤之余泽，故以称“后学”为自耀。再主刻先圣之遗书，借传自己之贤名。其二，吴革“每以崇正学基化本，宣德达情为己任”，其标准就是正统的儒学。朱熹是南宋及南宋以后所崇信的儒家代表人物。而要宣扬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说、理论和思想，莫过于刊行他的著作。吴革之所以在建宁府知府任上雕印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，并取六行款式，其意大概亦不出此。其三，吴革以建宁府知府身份，动用公帑雕印故乡先哲之遗著，自可不惜工本，尽量考究。

此本在清代曾是朱学勤、朱澂父子的插架之物，有“朱氏结一庐图书记”、“朱学勤修伯印”等印记可证。朱学勤字修伯，清仁和人，咸丰时代的藏书家。其书多得之于长洲顾氏艺海楼及同郡劳氏丹铅精舍。撰有《结一庐书目》四卷。其子朱澂，字子清，性好聚书。家藏素富，而他又竭力裒益之，因此精本充牣，亦著有《结一庐书目》。

此书之上又钤有“徐乃昌读”印记，证明又曾是徐氏藏书。徐乃昌字积馀，南陵人。藏书处曰积学斋。其藏书后归入北京图书馆。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，与此本为同版。清代武英殿曾摹刻此本，并为四库馆臣据以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业务处